

冯其庸 著

敬希集

冯其庸论红楼梦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故

平

集

冯其庸 著

敝帚集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敝帚集：冯其庸论红楼梦/冯其庸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12 (2011. 1 重印)

(名家解读红楼梦)

ISBN 978 - 7 - 5039 - 2627 - 3

I. 敝… II. 冯… III. 《红楼梦》研究—文集
IV. I207. 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1418 号

敝帚集——冯其庸论红楼梦

著 者 冯其庸

责任编辑 阎金燕

责任校对 方玉菊

封面设计 冯其庸 高海英

封面制作 玲 子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2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4.625

字 数 43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2627 - 3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我与《红楼梦》（代序）

我最初接触《红楼梦》是1943年我读无锡工专高中一年级时，那时有位范老师说《红楼梦》尽是讲做诗的，你喜欢做诗，去读《红楼梦》吧。但我读后却不感兴趣，因为《红楼梦》不是讲做诗的。

1946年，我考入无锡国专，那时著名的老师很多，如王遽常、朱东润、冯振心、吴白匋、周贻白等，1948年我转到上海无锡国专分校，由王遽常先生授诸子学，讲《庄子》，由童书业先生讲秦汉史，由顾佛影先生讲诗学，由王佩琚先生讲地理学，由刘诗荪先生讲《红楼梦》。这是我在课堂上正式听讲《红楼梦》的惟一的一学期。但那时听课很自由，想不听就不听，而我正着迷于词学，整天在顾廷龙先生的合众图书馆里撰写《蒋鹿潭年谱》和《水云楼诗词辑校》，所以刘先生的课，听了开头几堂就没有再听，但研究《红楼梦》是一门学问这一认识，这时算是确立了。

我真正读《红楼梦》是1954年到北京以后。我刚来北京就碰上批判胡适、俞平伯先生的运动。自己略无所知，只是认真地跟着学习，结合各人的文章，反复读《红楼梦》；也对别人的文章作比较研究，实际上这是我认真读《红楼梦》的开始，但却没有作研究。

1966年“文革”开始，我首先受冲击，也遭到了“抄家”，这在当时司空见惯，虽然很气愤，但毕竟不是我一人的遭遇。令我气愤而又吃惊的是把我的《红楼梦》抄走，而且当黄色书籍展览。这对我的刺激很大。因为明明在文学史课上都讲了《红楼梦》，怎么一下就把它作为黄色小说示众了呢？我生怕这一阵风刮向全国，会把这部巨著毁了，所以不管我当时正在受批斗，每天夜深人静以后，我就用毛笔据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朱墨两色抄写。因为每天只能深夜抄写，所以整整抄了一年。这一年的抄写，是我真正深入《红楼梦》的过程，联系当时社会的混乱状况，特别是许多朋友和熟人挨整后愤而自杀，我每每抄书到动情之处，不禁掩卷痛哭；到抄完这部书，我自觉从思想上与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相通了许多。我最后抄完了重读此诗时，忽觉这四句话实在就是一部《红楼梦》的最好的概括，此诗既是开头，更是全书的总结！从此以后，我大概算进入读《红楼梦》的真境界了。

1973年到1974年，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评《红》热潮，我由北京市委调去参加评《红楼梦》的写作组，当时一起调去约有六七个人。确定了全书的章节后，就由大家分头撰写，我写的是全书的“序言”、“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二百年来围绕着《红楼梦》的斗争”这三章，后来这三章收入我的《梦边集》。现在回头看二十多年前写的这些东西，自觉可以覆瓿。一是当时还是“文革”后期，评《红》都是以毛泽东主席对《红楼梦》的一些批示作为依据的，市委组织这个写作班子，其目的也就是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根据来评论《红楼梦》，所以不可能真正深入地研究《红楼梦》，只能停留在表面理解上；二是我自己对《红楼梦》的理解还有待于深入。不久前有人竟把我们当时写的这本书当做政治罪状来指责，不禁使我为之哑然失笑，他不知道这种故伎早已过时了！

当时，我写完了这三章后就提前离开写作组，到社科院历史所的

范文澜《中国通史》编写组去工作了。

我去社科院历史所参加范老《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要感谢黎澍同志和李新同志，他们为了调我去历史所，不知花了多少力气，有一段时间，黎澍同志一早起来就坐在电话机旁边向有关部门催调，而李新同志则不时给我电话，告诉我期在必去。虽然我去工作了一段时间，但终未调成，然而这两位前辈的殷殷爱护之情，我是终身难忘的。

1974年，袁水拍同志担任国务院文化组的副组长，有一次，他特地跑到铁狮子胡同一号我的住处找我，说要考虑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文化事业，并提到古籍整理的问题，我就建议校订《红楼梦》。他经过认真思考，觉得可以，就要我先起草一个报告，等李希凡同志从西安回来一起讨论。我很快就起草好了给他送去，后来这个报告由国务院批准了。由水拍同志担任校订组组长，由李希凡同志和我担任副组长，同时就向各地借调了一批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于1975年正式开始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正式进行了一年左右，到1976年初，不少借调来的同志都回了原单位，最后只剩我和吕启祥、林冠夫继续做校注工作。1976年也是社会和政局最动荡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到4月5日发生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群众运动；7月6日朱德总司令去世；7月28日，发生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月6日凌晨，江青等“四人帮”被捕，“四人帮”彻底垮台。在这样剧烈动荡的情况下，我们的校注工作也只好时断时续。不久，贺敬之同志出任文化部部长，他再次肯定并指示校注《红楼梦》的工作不能停，因此这项工作得以继续进行下去，直到1982年此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我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

从1975年到1982年整整七年，我一直在从事《红楼梦》的校注

工作，校注工作中遇到很多具体问题，例如曹雪芹的家世和祖籍问题，《红楼梦》的版本问题等等，结合当时的工作我依次研究了这些问题，并写成书出版。我最早研究的是曹雪芹的家世和祖籍的问题。

曹雪芹的家世和祖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究竟从何下手，颇费斟酌。恰好我的朋友外语学院的鲁宝元同志来看我，提到了有一部《五庆堂曹氏宗谱》，上面有曹雪芹上祖的世系。我说这部书曹家早已献出去并且已经在“文革”中丢失了，我在1963年故宫文华殿举行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文物展览时，曾经隔着玻璃柜看过，现在要研究它，已经没有原始资料了。鲁宝元同志说，他知道在曹仪策先生手里还有一本底本，也是老本子，他可以帮我去向曹仪策先生商量，借出来进行研究。过不了几天，他就来陪我去看曹仪策先生，曹先生一口答应将此谱借给我，他说过几天给我送去。果然没有几天他就将《五庆堂曹氏宗谱》送来了，在我手里留了一个月，我为他写了跋文，并录了副本，拍了照片，以备研究，将原本归还了他。

我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和《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的研究，是从查实谱上人物入手的，结果却查出来一系列重要的文献资料，大大充实了我的研究。现将这些文献资料和我的研究结果概述如下：

一、《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八年甲戌 (明崇祯七年，1634)条：

墨尔根戴清贝勒多尔袞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

这是清代官方文献资料中有关曹雪芹上世的最早的一条史料。这条史料的价值：一是，它说明了曹振彦此时已归到多尔袞属下，这是他后来发迹的一大契机。根据《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天聪四年四月的

时候，曹振彦在额驸佟养性部下当“教官”，佟养性的部队是“乌真超哈”（汉语为重兵），是督造红衣大炮的。佟养性所率的都是“汉军”，是“汉军”总理，故曹振彦当时也该是“汉军”；但到天聪八年，他已到多尔袞属下，入了正白旗。这一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佟养性于天聪六年去世的缘故。但应该注意到天聪四年九月的《玉皇庙碑》上，曹振彦已是“致政”。经研究，“致政”就是“致仕”。也就是“退休”。曹振彦此时尚是少壮之年，不可能退休。那么这时或许他已不属佟养性的部下也未可知，这个问题还得等有更新的文献资料出来，才能解决。二是，它说明曹振彦此时已升为“旗鼓牛录章京”即“旗鼓佐领”了。按“旗鼓”是指作战部队，以与“管领下人”——从事生产的农奴、工奴相区别。“佐领”是掌握三百人的军职，是有实权的。正白旗属上三旗，归内务府。所以入关后其子曹玺、孙曹寅都属内务府，其原因即在此。三是，它说明曹振彦“因有功”，又升了半级。当时明金双方战争频繁，曹振彦的“功”自当是战功，在此之前天聪五年有大凌河之战，曹振彦也可能是参加这次战争而立功的，是否如此，亦当待有确切的资料才能论定。

总之，这条天聪八年的材料，是研究曹雪芹家世的非常重要的资料。

二、两篇《曹玺传》

1. 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

曹玺，字完璧，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父振彦，从入关，仕至浙江盐法道，著惠政。公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负经济才，兼艺能，射必贯札。补侍卫之秩，随王师征山右建绩。世祖章皇帝拔入内廷二等待卫，管銮仪事，升

内工部。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江宁局务重大，黼黻朝祭之章出焉。视苏杭特为繁剧。往例收丝则凭行佞，颜料则取铺户，至工匠缺则金送，在城机户有帮贴之累。众奸丛巧，莫可端倪，公大为厘剔。买丝则必于所出地平价以市；应用物料，官自和买，市无追胥，列肆案（安）堵；创立储养幼匠法，训练程作，遇缺即遴以补。不金民户，而又朝夕循拊稍食。上下有经，赏赉以时，故工乐且奋。天府之供，不戒而办。岁比稔，公捐俸以赈，倡导协济，全活无算，郡人立生祠碑颂焉。丁巳、戊午两督运，陛见，天子面访江南吏治，乐其详剖。赐御宴、蟒服，加正一品，更赐御书匾额手卷。甲子六月，又督运，濒行，以积劳感疾，卒于署寝。遗诫惟训诸子图报国恩，毫不及私。江宁人士，思公不忘，公请各台崇祀名宦。是年冬，天子东巡，抵江宁，特遣致祭。又奉旨以长子寅仍协理江宁织造事务，以继公绪。寅，敦敏渊博，工诗古文词。仲子宣，官廕生，殖学具异才。人谓盛德昌后，自公益验云。

2. 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传》：

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世选生振彦，初，扈从入关，累迁浙江盐法参议使，遂生玺。玺少好学，沉深有大志，及壮补侍卫，随王师征山右有功。康熙二年，特简督理江宁织造。织局繁剧，玺至，积弊一清，干略为上所重。丁巳、戊午两年陛见，陈江南吏治，备极详剖。赐蟒服，加正一品，御书“敬慎”匾额。甲子卒于署，祀名宦。子寅，字于（子）清，号荔轩。七岁能辨四声，长，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尤工于诗，伯仲相济美。玺在殍，诏晋内少司寇，仍督织江宁。特敕加通政使，持节兼巡视两淮盐政。期年，疏贷内府金百万，有不能偿者，请豁免。商立祠以祀。奉

命纂辑《全唐诗》、《佩文韵府》，著《练（棟）亭诗文集》行世。孙颙，字孚若。嗣任三载，因赴都染疾，上日遣太医调治，寻卒。上叹息不置，因命仲孙頰复继织造使。頰字昂友，好古嗜学，绍闻衣德，识者以为曹氏世有其人云。

以上两篇《曹玺传》是曹雪芹家世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文献。这两篇传实际上是上下篇，两篇传一共写了七个人，曹世选、曹振彦、曹玺、曹寅、曹宣、曹颙、曹頰、重点是曹玺和曹寅。但对其他几个人，这两篇传记也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以往，反映曹家上世历史资料最多的莫过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四“附载满洲旗分内之尼堪姓氏”下的“曹锡远”条，该条说：

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份无考。其子曹振彦，原任浙江盐法道。孙曹玺，原任工部尚书。曹尔正，原任佐领。曾孙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宣，原任护军参领，兼佐领。曹荃，原任司库。元孙曹颙，原任郎中。曹頰，原任员外郎。曹頫，原任二等侍卫兼佐领。曹天佑，现任州同。

这段文字共 112 个字，写了 11 个人。除开头曹锡远占三句话外，其余都是每人一句。对研究曹雪芹家世来说，虽然只一句，也是重要的。但比起两篇《曹玺传》来说，毕竟《曹玺传》详细得多了。更难得的是这两篇传，一篇是康熙二十三年的（1684），另一篇是康熙六十年的（1721）。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则是乾隆九年（1744）的书，前者比它早了六十年，后者比它早二十三年。总起来说，这两篇传，都是曹家未败落时的记录，所以它的直接性和真实性都是无可置疑的。

这两篇《曹玺传》给我们新增的认识：一是曹世选单名“宝”，曾“令沈阳有声”，并且家沈阳；二是曹家的远祖是宋武惠王曹彬；三是曹家“著籍襄平”，“襄平”是辽阳的古称，也即是说曹家的籍贯

是辽阳；四是曹振彦是“扈从入关”的，但未提曹世选；五是曹玺曾参加平姜瓖之乱，并被选拔为内廷二侍卫，在江宁织造任上做了不少有益于民众的事，郡人立生祠碑以颂；六是曹寅于康熙二十三年曹玺死后即奉命“协理江宁织造事务”，他“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即程朱理学；七是曹荃确实原名“曹宣”；八是曹颀字“孚若”；九是曹頔字“昂友”。以上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所以这两篇传记的发现，是曹雪芹家世研究的一大进展。

三、辽阳三碑

辽阳三碑，也是近二十年来发现的有关曹家上世史实的重要实物，碑上的文字对研究曹家入关的情况十分重要。

事情是这样的，1976年初，我在《文物》杂志上和《文艺研究》上，先后发表了《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一文，文中提到了《曹玺传》里明确记载曹家“著籍襄平”（即辽阳）的问题。之后就收到了辽阳同志来信，告诉我辽阳现存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事，我立即到辽阳去验看了此碑。在看完此碑后，我提出请他们仔细查一下，是否还有第二块有关曹家的碑。之后不久，又收到了辽阳同志的来信，说找到了另一块有曹振彦署名的碑。我立即又赶去验看，果然是一块有曹振彦署名的碑，碑名《重建玉皇庙碑》。在验看这一块碑的同时，辽阳的同志又提出了小学门口还有一块碑，不知与曹家有没有关系？于是我立即请他们带去验看。碑很高大，我站在课桌上才能看清碑阴的人名，果然有曹得先、曹得选、曹世爵三个人的名字，这都是《五庆堂谱》三房的人名。这块碑的名字叫《东京新建弥陀寺碑》。

对于以上三块碑，我都作了研究。

《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从时间来说，它比《清太宗实录》天聪

八年要早出四年，但前者是官方文献最早的一条，后者是地方实物中最早的一件，各具特殊的意义。《喇嘛碑》的重要之处是它揭示了曹家上世在属多尔衮的正白旗之前，先是属佟养性的“旧汉兵”或“旧汉军”，属“乌真超哈”部队（红衣大炮部队），此时曹家归附后金已首尾十年。其次是上述两篇《曹玺传》说：“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著籍襄平。”“襄平”就是辽阳，现在这块《喇嘛碑》又在辽阳发现，则对两篇《曹玺传》所说的曹家的祖籍是辽阳，是一个重要的实证，特别是碑阴与曹振彦并列的这些人，我已查清楚十名，其中如宁完我、石廷柱、金玉和、祝世昌、吴守进、张大猷、金砺等七名都是辽阳人，则可见当时佟养性部下辽阳人不少。《玉皇庙碑》是天聪四年九月（1630），比《喇嘛碑》只晚五个月，而此碑已无曹振彦军职，只署“致政”，当是其隶属及职务正在变动之际，尚未确定。至天聪八年，则已归多尔衮之正白旗，为“旗鼓牛录章京”（旗鼓佐领）。则此碑为我们提供了曹振彦由佟养性属下转变为多尔衮属下的一个变动初步的情况。这同样是曹雪芹上世的重要实证资料。《弥陀寺碑》则是《五庆堂谱》曹氏三房上祖的署名碑，碑阴曹得先、曹得选、曹世爵三人，都是《五庆堂谱》上的人名。《五庆堂谱》原称“辽东曹氏宗谱”，现在在辽阳发现五庆堂上祖的署名碑，则对《五庆堂曹氏宗谱》亦是提供了一件重要的实物证据。五庆堂三房是孔有德的部下，此碑的功德主正是“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与史实全合，则更加增加了《五庆堂谱》的可信性。

所以上辽阳三碑，是研究曹雪芹上世的重要的历史文物、历史见证，是弥足珍贵的。

四、天聪七年孔有德降金书

1975 年左右，我在写《曹雪芹家世新考》的过程中，无意中于旧

书里发现了孔有德、耿仲明的降金书，此件的满文照片发表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十周年纪念文献特刊》上，下面是此件的汉译原文：

总提兵大元帅孔有德

总督粮饷总兵官耿仲明

为直陈衷曲，以图大业事：照得朱朝至今，主幼臣奸，边事日坏，非一日矣！兵士鼓噪，触处皆然，非但本帅如此也。前奉部调西援，钱粮缺乏，兼沿途闭门罢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气吞声，行至吴桥。又因恶官把持，以致众兵奋激起义，遂破新城，破登州，随收服各州县。去年已有三次书札，全未见复，始知俱被黄龙在旅顺所截夺。继因援兵四集，围困半载，彼但深沟高垒，不与我交战。彼兵日多，我兵粮少，只得弃登州而驾舟师，原欲首取旅顺为根本，与汗连合一处，谁知飓风大作，飘至广鹿岛（大连海中）。本帅即乘机收服广鹿、长山、石城诸岛，若论大海，何往不利？要之终非结局。久仰明汗网罗海内英豪，有尧、舜、汤、武之胸襟，无片甲只矢者，尚欲投汗以展胸中之伟抱；何况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备，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与汗为敌乎？此出于一片真热心肠，确实如此。汗若听从，大事立就，朱朝之天下，转瞬即汗之天下。是时明汗授我何职，封我何地，乃本帅之愿也。特差副将刘承祖、曹绍中为先容，汗速乘此机会，成其大事，即天赐汗之福，亦本帅之幸也！若汗不信，可差人前看虚实如何。本帅不往别地，独向汗者，以汗之高明，他日为成大事，故效古人弃暗投明也。希详察之！为此合用手本，前投明汗驾前，烦为查照来文事理，速赐裁夺施行。须至手本者。

天聪七年（按：崇祯六年）四月十一日

孔有德是如何投降的，与我们的研究关系不大，但这个《投降书》里提到“特差副将刘承祖、曹绍中为先容”这句话，这个“曹绍中”就是《五庆堂谱》上的人物，他在《五庆堂谱》上是第十世，与同谱上四房的曹振彦是同世次。《清太宗实录》卷十四，“天聪七年癸酉：孔有德、耿仲明等，自镇江遣副将曹绍宗、刘承祖等，奏报起程日期”。（文长，下略）这里的曹绍宗，也就是《投降书》上的曹绍中，满文译字音同字异之故。此事《清史稿·孔有德传》有详细记载，其中亦有“复遣所置副将曹绍中、刘承祖等奉疏言，将自镇江登陆……”等语。（文长不录）《五庆堂谱》十世列：致中、化中、绍中、纯中、权中等数十人。其中曹绍中是这样一段谱文。“养性子，字柱石。指挥僉事，骠骑将军。子贵，诰封光禄大夫。配王氏，续配何氏，俱封一品夫人，生三子：长德先、次仁先、三义先。女一，适沈。”这段文字很简单，不能说明谱上的曹绍中是否就是送《投降书》的曹绍中。但幸好《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一：“崇德五年庚辰”有“三等梅勒章京曹绍宗老病，令其子仁先袭替”这两句话，而上引谱文正好写明，曹绍中的第二个儿子叫仁先。而长子曹德先是跟着孔有德一直打到桂林去的，孔有德封为定南王，留驻桂林。曹德先也留在桂林。顺治九年壬辰七月初七日，李定国攻破桂林，火焚定南王府，曹德先全家一起烧死，谱上说赐葬河北省涞水县张坊镇沈家庵村，我曾去作过调查，墓基完整，还有一块完好的界碑，其他一如谱上所记。所以送《投降书》的曹绍中，确就是《五庆堂谱》上的曹绍中。《五庆堂谱》也确是可信的。在拙著《曹雪芹家世新考》重订本里，有详细的论证，此处不赘。

五、康熙抄本《沈阳甘氏家谱》

我在研究曹雪芹家世的过程中，借到了康熙时的原抄本《沈阳甘

氏家谱》，我们一直知道康熙十二年因吴三桂叛乱而自刭于镇远府的云贵总督甘文焜与曹雪芹的上祖有亲戚关系，这从曹寅的《过甘园》诗就表明了这种关系，诗中自注称甘文焜为“总制公”，称甘文焜的第三子甘国基为“鸿舒表兄”，这重“表亲”关系究竟从何“表”起的呢？康熙抄本《沈阳甘氏家谱》：“六世，体垣，行一，字仰之。生于万历戊申年七月初三辰时，仕至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令。于顺治九年正月初三日海寇作乱，守节殉难，士民爱戴，立祠春秋祭祀。元配曹氏，沈阳卫指挥全忠曹公之女，生一子，如柏。”嘉庆、道光《沈阳甘氏家谱》均同。再检《五庆堂曹氏宗谱》十世曹权中说：“养勇子，字时轩，指挥使。配徐氏，封夫人，生子振先。女一。适甘公体恒室，甘国圻母。”这里的曹权中，也即是甘谱里的曹全忠，音同字异，而这里的甘体恒，也就是甘谱里的“甘体垣”，“恒”与“垣”形近而误。曹、甘两谱互相对应，除了音同字异和形近而误外，其他都很符合。找出这曹、甘两家的姻亲关系对研究曹雪芹上祖的家世至关重要：一是曹、甘两家都在沈辽地区，曹家祖籍辽阳，还曾一度住沈阳，且五庆堂曹原本就在辽阳，而甘氏是在沈阳，故甘、曹两家地域相邻。二是原先有些人硬说《五庆堂谱》上第四房即曹锡远、曹振彦这一系是硬装上去的，并非谱上原有。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现在找出这重姻戚关系来，特别是找出四房的后裔称三房上世的祖姑之子为“表兄”，这恰好说明了《五庆堂谱》上的四房与三房，原是同气连枝，一条根上生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一层血缘关系，曹寅怎么可能称甘国基为“鸿舒表兄”？所以要想把《五庆堂谱》上的四房和三房拆开也是拆不开的，因为他本来就是连理枝。从根子上就血脉相连了，怎么可以拆得开呢？曹寅的这首《过甘园》诗，就像一把金锁，把甘家和曹家；曹家的四房和三房，都紧紧地锁在一起，要拆也拆不开了。

六、曹頌的抄家和曹家的败落

曹頌的抄家和曹家的败落，是曹雪芹家世研究和《红楼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20世纪80年代又发现了有关曹頌和曹寅的几个重要档案。这就是《曹頌骚扰驿站获罪结案题本》（雍正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刑部为知照曹頌获罪抄没缘由业经转行事致内务府移会》（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刑部为知照查催曹寅得受赵世显银两情形事致内务府咨文》（雍正七年十二月初四日）。这几个重要档案的发现，使我们对曹頌的抄家和败落的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具体的认识。现在我把曹頌被罪抄家事件的全部过程，依据文献资料，作一排列，以见事情的来龙去脉：

1. 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初四日，“上谕织造差员勒索驿站，着交部严审”。这是曹頌骚扰驿站案的始发。在这份“上谕”里，（1）表彰了塞楞额敢于“据实参奏，深知朕心”，“着议叙具奏”。（2）“织造人员既在山东如此需索，其他经过地方，自必照此应付，该督抚何以不据实奏闻？着该部一一察议具奏。”（3）“织造差员现在京师，着内务府、吏部，将塞楞额所参各项，严审定拟具奏。”在这份档案材料里，丝毫没有提及织造亏空等事实。也即是当时曹頌的罪名，与织造任上的经济亏空无关。

2. 在驿站案爆发以后十一天，即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著李秉忠、隋赫德接管孙文成、曹頌织造事务”。在这份“上谕”里，孙文成是以“年已老迈”被撤换的，曹頌是因“审案未结”被撤换的，仍然未涉及织造亏空问题。

3. 在曹頌被撤去江宁织造以后十天，即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谕著江南总督范时绎查封曹頌家产”。在这份“上谕”里曹頌被查封的罪名就与驿站案毫无关系，具体的罪名就是“行为不端，织